

北京

由傳統國都到社會主義首都

薛鳳旋 著



北京

由傳統國都到社會主義首都

薛鳳旋 著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香港大學出版社

香港大學出版社
香港薄扶林道 139 號

© 香港大學出版社 1996
1996 年初版
ISBN 962 209 411 2

版權所有。本書任何部份之文字及圖片，
如未獲香港大學出版社允許，
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本書相片蒙下列機構提供，謹此致謝：
新中國新聞有限公司 (xxiii, xxv)
北京出版社 (xxiv, xxvi–xxx)
和平圖書有限公司 (xxxi–xxxviii)

彩印制作公司承印

自序(中文版)

作為中國人，以中文出版我對中國城市的研究自然是我的心願。然而在香港這個有 150 年以上歷史的殖民地，就算是在現今的最高學府——香港大學，仍存有一種不正確的看法：中文出版的學術著作的地位是受到質疑的。很多時，在教授的升職或聘用上，中文著作往往不如實的被接受為學術著作。不過，我仍然努力在可能的情況下以中英文雙語出版我的學術成果，使我能直接和十多億的中國人溝通。

《北京》這本書的有關資料大部分(八成左右)是中文的，但成稿卻是英文的。這是因為外國出版社的邀請觸發起我對北京作出詳細的研究。在這個激勵和責任壓力之下，我花了約四年的時間，完成了英文稿。但由開始進行這研究起，我便下了決心：北京是我們中華民族歷史悠久的國都，也是我國現行的國都，有着廣泛的代表意義，我一定要以中文成書！結果在英文版定稿之後努力從英文出版社 (John Wiley) 爭取中文版權，並再花了六個月的時間，按英文版的初稿寫成目前的中文版。這本書實際上不是翻譯出來的，它是由同一作者執筆，在同一的素材，邏輯思維和分析方法之下寫成的不同版本而已。而且，中文版要比英文版為好，因為它用的是我的母語，加上中文版比英文版更詳細。英文版因為篇幅所限，對初稿簡約了四萬字，三十多幅圖和近四十個表，而中文版卻是百分之百採納了英文版首稿的全部資料。

能完成《北京》一書，是我很大的滿足。作為城市地理學者，我覺得很幸運能肩負這個使命。二十多年來涉獵了世界各國的城市研究和理論，覺得對於中國城市的研究仍很缺乏。有幸我在言語和文化上能對中國的資料和實況有較深入的理解，而對於以英語為主要出版語言的世界城市研究亦能溶匯貫通；更有幸的是我得到了北京不少前輩和學者的幫助。他們在資料、理論、概念和方法上對我很大的激勵。當然，北京乃至國內其他地方都有一大批知名的北京研究學人，他們不少的研究成果廣為此書引用，是我這研究的基礎。通過了這些努力，我感到中西方

的研究的確各有千秋。中國學者往往詳盡細緻，西方學者則長於大膽假設與推理。兩者實在是可以互補而得以更為長進的。

《北京》一書在溶匯中西理論與方法的基礎上，嘗試了對中國傳統城市的性質和規劃提出了創新的見解，對解放以來北京的規劃和功能亦有新的體會。這些在英文版序中有具體的介紹。

我在 1972 年夏天首次踏足北京，至今已 23 年了。這對於了解一個城市似乎是足夠的了。然而對我首位碰上的北京學者侯仁之教授來說，我仍是個小伙子而矣。侯教授對北京的研究窮五十多年精力，有關論文及篇著不下二百多種。對我的努力，侯教授一直支持與鼓勵。除了侯教授外，我亦特別向胡兆量教授致謝，胡教授乃侯教授的弟子，本身亦是北京權威。《北京》能夠成書，他作出很大的幫忙；我亦感謝他為中文版作序。

我也借此祝願北京，我們民族和文化的代表，能萬古常青，永遠站立在世界城市之前列。

薛鳳旋

1995 年 11 月於香港大學

英文版序

我是在香港長大的。這裏的人口絕大部分是中國人，但它的城市卻構築在英國的規劃傳統上，具有一定的殖民地色彩。我在香港所受的教育和到倫敦大學的攻讀，培養了我對西方工業國城市理論和有關規劃的認識。我對一個真正的中國城市的認識要遲至 1970 年。該年我首次在一個中國大陸城市——廣州——的街上溜躑。這次經歷使我意識到中國城市在一個獨特的制度之下如何與世界其他城市迥異。而這個中國城市自後一直在文化上和感情上牽引着我。

自從上大學一年級以來，我對中國歷史、哲學和文學都有一種發自對國家民族和文化要求理解和愛護的強烈興趣。亦因為如此，我對中國時事及其他發展都密切注意。然而那次與廣州的邂逅，令我經常回到中國大陸去尋訪中國城市的真貌。

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意識形態和政治上的自我封鎖，加上言語和文化上的分隔，至 1980 年代為止，中國城市的狀況和性質一直未被深入研究，成為了城市地理學上一個近乎空白的項目。自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改革以來，中國城市和中國城市化的研究和有關的出版開始活躍起來。拙作《中國城市》(牛津出版社，1985 年)成為西方出現的有關首本專著(可惜是以英文出版)。然而近年來的這些出版和論文都比較集中在鄧小平的新統治哲學如何影響有關發展，即是說在新的市場力量和新的政府政策之下，中國城市化過程如何急劇的提升以及城市面臨怎樣的新變化。鄧小平的影響力會持續多久？它對中國城市有怎樣的具體影響？這些有趣而重要的問題成為了近年研究的核心。但有兩個更為重要的命題卻被冷落了，即：中國城市的性質是怎樣的？是否存在一個不為時間和政府政策及統治哲學所轉移的不變的中國城市模式？以往的學者如屬希(Soothill, 1951)，毛(Mote, 1977)，章生道(1977)，韋比(Wright, 1977)及史堅拿(Skinner, 1977)對傳統的或解放(1949)以前的中國城市作出了詳細的研究後，給了我們肯定的答案。可惜他們的研究並沒有伸

延和包括 1949 年以後在共產主義政府下發展或改變了的中國城市。

在五十年代時中國學者曾對中國傳統城市及當日(即解放前後)的中國城市掀起了研究熱潮。不過,很可惜這些研究一般都是描述性的,而且對當時國外同類和已存在的研究和它們在方法和理論上的成果並不知曉,也沒有相連之處。五十年代後的政治左傾和其後的文化大革命(1966-76)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內的社會科學研究做成了廣泛的打擊,對中國城市的研究因而近乎停頓下來。自 1980 年以來,這方面的復甦卻亦不如人意。它們似乎反映了對中國以外的有關研究的偏好。除了對傳統中國城市的描述性探索外,則着重對 1978 年中國改革開放後市場因素和政府寬大的城市化政策如何影響城市的發展這一命題,以及有關的資料搜集和應用性的研究。對於現代中國城市和傳統中國城市的關連,和中國城市在毛澤東時代(1949-78)的新發展如何總結和理論化並沒有多少人努力。

上述的缺點使我們難以充份理解現代的中國城市和對它的將來發展作出合理的預測。本書的目的乃以北京為實例以填補這個學術上的空隙。作為金、元、明、清四代約 800 年的中國首都,北京保留了傳統中國城市的許多特點,包括了紫禁城、內城的不少禮儀建築、舊皇城的街巷以及眾多的四合院等。中國有一個歷史悠久的傳統,即全國城市按其大小序列,一概要在原則上(程度、規模和其地位一致)在城市的性質和布局上仿效首都。1949 年以後,這個原則亦在毛澤東思想及中央規劃體制下被延續下來。因此對北京的城市功能、布局、規劃標準以及城市生活的了解,實際上亦幫助了我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內的城市體系中的較次等城市的了解。

本研究的一個重要結論乃中國城市的興起,並不是因為貿易的需要,或是手工業發展的集中,而是因為它的一種特殊功能,此乃它是人和上天溝通以及將這些訊息傳播開去的吉祥之地。是這個動力推動了城市的其他功能使它得以興起。這種特殊的訊息功能在中國的史前期是以「明堂」這個建築來體現的。約在二、三千年前,《周禮·考工記》更將中國這個由「明堂」逐步演化而成的國都規劃制度化成為中國城市規劃的最古老經典。

1949 年後的北京承受了一個新的城市發展動力——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然而北京仍保存其古老的國都功能,即「訊息和控制」功能和對國內其他城市起典範作用。這顯示它繼承了中國國都的前身,「明堂」的精神——國都應是全國的訊息和控制中心。當然,1949 年後的關鍵性資訊並不是甚麼上天的啟示,而是國家重大的政治、社會和經濟決策。

這個古老而又現代的北京市的主要功能和富理曼(Friedmann, 1986)的世界城市概念不謀而合。富理曼認為當今世上的最重要城市不再是重要的生產和貿易中心，它們的主要功能乃是金融機構和跨國公司的總部。這些城市在國內和國際上舉足輕重的地位，並不建基於它們的生產和貿易活動，而是在於它們通過資訊、通訊和金融的力量而控制世界範圍內的物質生產和消費。北京自 1949 年以來偏向於「生產型」的活動以及強調自給型經濟，不但削弱了它作為全國訊息及控制中心的功能，亦導致它廣泛的所謂「大城市病」，即基礎設施不足，交通擠塞，人口過多及環境污染。目前北京市的規劃師和學者都認識到要控制和壓抑它的生產功能以及發展高檔次的第三產業以適應它作為中國國都的地位。

此書通過對北京 1949 年後的發展以及其悠長的歷史的探索以揣摩其城市性質。這些探索涉及了它的城市規劃，城市經濟發展，人口的空間分布及不同時期的變化，城市交通和住房問題，城市環境，社會空間結構以及北京市和鄰近區域的關連等。

從中國城市這個廣闊的研究領域來看，我這裏展示的不過是微不足道的成果。願以此拋磚引玉，期待後來者使這片學術空間，有更豐盛的果實。我更在此感謝那些一直幫助，鼓勵和愛護我的人，使我能鍥而不捨地去探究中國城市的性質和特點。

薛鳳旋

1995 年 1 月於香港大學

代序

薛鳳旋教授近作《北京：由傳統國都到社會主義首都》一書，對城市的歷史文化淵源作了系統的探索。將自然與社會經濟融為一體，將有形的物質形態研究與無形的文化意識研究融為一體，從無形中尋找有形的根據，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地理學，特別是人文地理學，發展的新趨勢。《北京》是反映這一趨勢的成功範例。從另一方面說，對於具有悠久歷史和深厚文化背景的中國首都，只有從文化意識入手才能揭示其有別於世界其他城市的個性，才能揭示其深刻的根源。

此外，《北京》在學術上還有四個特點：

- (一)全面分析我國首都的第一部城市地理巨著。我國經歷了幾千年封建社會。行政對城市發展有決定性影響。剖析北京可以洞察全國城市發生和發展的機制，洞察全國城市空間布局的形成機制。從這一點說，北京是中國城市地理研究中最具典型意義的。
- (二)以國際城市研究，特別是以國際對北京城市研究的前沿為起點。書中概括了國際學術界對城市的主要觀點，匯集了國際研究北京學者的主要成就。站在前人的肩上，使得專注一起步就踏入學術的殿堂。
- (三)牢牢地把握着 1949 年以來兩個體制對城市發展的影響。一個是 1978 年以前的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一個是 1978 年改革開放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把握着這兩個要點，就把上起商周下至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融匯貫通，上下數千年一氣呵成，既尊重古老傳統，又具備時代氣息。
- (四)同時用英文和中文推向世界，起到向世界介紹北京，向國內介紹世界城市地理成就的雙向作用。一部優秀作品，經由後人翻譯轉介的不乏其數。由作者同時用雙語推出的確是鳳毛麟角。

對於具備上述學術素質的專注，評估為中國城市地理學的劃時代作品是當之無愧的。

薛教授是開放以來第一批北上的香港學者之一。我與薛教授的學術交往已有十餘年了。四年創作期間，薛教授六次北上，考察切磋。我系兩位研究北京的碩士生楊旭和曾贊榮有幸得到教授多次教誨。孔子說：「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論語，雍也篇》。作為香港大學地理及地質學系主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薛教授在海內外有不少兼職。在繁忙的教學和社會活動負荷下，沒有樂在其中的境界是難以完成這一巨著的。

兼備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良好素養是薛教授能夠完成《北京》一書的重要前提。像薛教授這樣的雙語精英在香港也屬罕見。只有學貫中西，才能「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探索內容浩瀚的主題。

在祝賀《北京》的英文版和中文版同時發行的前夕，企望風華正茂的薛教授不斷有新的佳作問世。

胡兆量

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系

1995年8月18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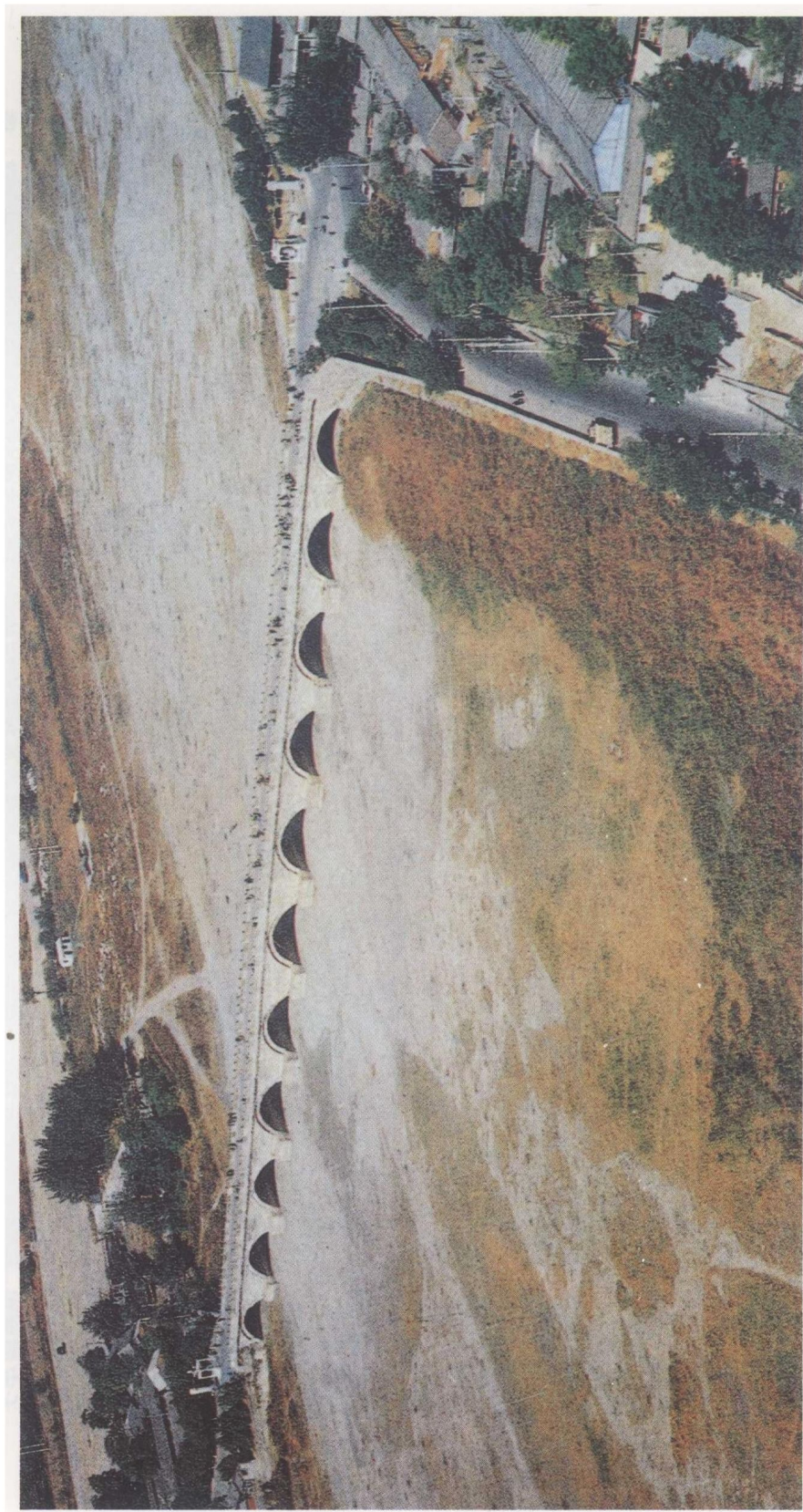
宮城與皇城——宮城，即圖上方紫禁城南門(午門)與北門(神武門)內的地方。城牆，其上四個角樓及東西護城河清楚可見。圖下方為皇城的東西主軸，亦是北京市內的最寬主街長安街。它與舊城中軸線在天安門前相接。圖中由北而南可見的中軸線上的建築包括了景山上的五龍亭，神武門，三小殿，三大殿(坤寧宮，交泰殿，乾清宮，保和殿，中和殿，太和殿)，午門，端門及天安門。端門東面一組建築是太廟，西面一組是社稷壇，從南向定位，正合「左祖右社」的規格。天安門前亦見外金水河，內金水河在午門後亦隱約可見。西護城河以西的水面為三海(即北海，中海，南海)。



鐘樓和鼓樓——中軸線北端上的鐘鼓樓位在景山以北，週圍為眾多的平房式的四合院，多是明清建築。圖北有六、七十年代的多層式住宅，此圖拍於 1980 年代初。



天安門廣場——廣場面積 60 公頃，是世界上最廣的廣場，中為人民英雄紀念碑，其南面方型建築乃毛主席紀念堂。廣場南沿為前門。



盧溝橋——建於明元代，乃北京在洪積扇上形成的多水道小平原的地理優勢的一個標誌。



雄偉的長城——北京懷柔縣城北 20 公里的長城，兩旁羣山重疊，山勢陡峭，易守難攻，是這些北面的天然和人工屏障，使北京在歷史上自秦以來一直是個軍事重鎮。



1984 年完成的三環路交匯處的三元立交橋體系。注意立交橋上及三環路上的自行車及自行車道，以及三環路上的綠化及十分寬餘的建築紅線寬度。這裏有「大馬路」主義的感覺嗎？



八十年代中的北京市區已經出現大量的高層建築，衝破了低矮的四合院輪廓。圖中的國際酒店乃當時市內最高的現代建築，但在 90 年代它卻較比隣新建築低矮了很多。